

# 与克劳德·罗森为伴：重读中外文学中的野蛮书写

## In the Company of Claude Rawson: Revisiting the Writings of Barbarism i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王松林 (Wang Songlin)

**内容摘要：**克劳德·罗森是一位享誉世界的 18 世纪文学研究专家，他的研究视野宽阔，博大精深，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但是，罗森的研究不是为了跨学科而跨学科，而是在充分把握相关学科的文献和史料上展开的以文学文本为中心的研究。罗森反对文学研究中过度理论驱动的抽象批评，主张具体文学文本在批评中的核心地位。罗森善于捕捉文本的微妙之处，在精细的文本和史料分析中发掘不易为人发现的道德情感和复杂的人性悖论。在罗森看来，优秀的文学批评应该具有伦理关切。这一观点他多次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研讨会开幕式的致辞中有明确阐述，也在对文学中的野蛮书写和欧洲想象的独到分析中得到充分体现。罗森的文学批评观对重读中外文学的野蛮书写及其文化隐喻具有重要启示。本文以罗森的《上帝、格列佛与种族灭绝》的批评理念为参照，对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鲁迅的《狂人日记》、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酒国》等中外小说中的“吃人”书写做了文化阐释。

**关键词：**克劳德·罗森；跨学科性；文本中心；野蛮与吃人

**作者简介：**王松林，博士，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 19 世纪英国文学、外国海洋文学和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

**Title:** In the Company of Claude Rawson: Revisiting the Writings of Barbarism i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Abstract:** Claude Rawson is a world-renowned expert in eigh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and his research, immensely broad, judicious and erudite, is an exemplar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However, Rawson'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s not for the sake of interdisciplinarity. It is instead a study based on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literary texts and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s, backed with his profound knowledge of related disciplines. Rawson opposes the excesses of theory-driven abstraction i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endorses the centrality of the particular literary text in criticism. In his elaborate analysis of the textual nuance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he

unveils in many ways the complexities and paradoxes of moral sentiments that are not readily apparent. Rawson's critical idea that "good literary criticism is ethical" is best demonstrated in his man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for the opening ceremonies of various annual symposiums of IAELC as well as in his innovative analysis of the writings of barbarism and European imagination in literature. Rawson's view of literary criticism sheds lights on rereading the writings of barbarism and cannibalism and their cultural metaphor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Borrowing Rawson's critical approaches in his *God, Gulliver, and Genocide*, this paper attempts a cultural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writings of cannibalism in Daniel Defoe's *Robinson Crusoe*, Lu Xun's *The Diary of a Madman*, Chen Zhongshi's *White Deer Plains* and Mo Yan's *The Republic of Wine*.

**Keywords:** Claude Rawson; interdisciplinarity; centrality of literary text; barbarism and cannibalism

**Author:** Wang Songlin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01, China). His academic interests include 19<sup>th</sup>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sea literature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wangsonglin@nbu.edu.cn).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教授克劳德·罗森 (Claude Rawson) 是一位享誉世界的 18 世纪文学研究专家, 著名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 称他是当今学界“最具鉴赏力的、最敏锐的 18 世纪研究专家之一” (2001)。罗森教授的研究视野宽阔, 博大精深, 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但是, 罗森教授并不是为了跨学科而跨学科, 而是在充分把握相关学科的文献和史料上展开的以文学文本为中心的文史互证研究。罗森教授反对文学研究中从理论到理论的“不读而论”, 主张要恢复文学文本在批评中的中心地位。他特别善于捕捉文本的微妙之处, 在精细的虚构文本分析和扎实的史料分析中发掘不易为人觉察的道德情感和人性悖论。在罗森教授看来, 优秀的文学批评应该具有伦理关切, 这一观点尤在他的斯威夫特系列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与罗森教授为伴, 在他的引领下重读中外文学中的野蛮书写, 可以重新发现埋伏在语言背后丰富的历史文化隐喻。

### 一、我与克劳德·罗森的交往

我与罗森教授的交往始于 2012 年。那年春天, 罗森教授应邀以教育部海外名师的身份前来中国讲学, 经由恩师聂珍钊教授的引荐, 我在华中师范大学桂苑宾馆拜访了罗森教授。彼时, 我与聂珍钊教授一起正在策划翻译出版一套名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的丛书, 已获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并将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经过精心挑选, 罗森教授的《格列佛、上帝与种族灭绝: 野蛮与欧洲想象 (1492-1945)》

(*God, Gulliver, and Genocide: Barbarism and the European Imagination, 1492-1945*) 入选本套丛书, 我有幸与同事一起承担该书的翻译工作, 记得这本书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玛乔瑞·帕洛夫 (Marjorie Perloff, 1931-2024) 推荐的。初见罗森教授, 翻译过程中脑海里不时浮现的那位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学者的影子渐渐变得清晰。罗森教授腿脚略有不便, 手握拐杖, 体态微胖, 目光睿智, 谈吐风趣, 平易近人。深入交谈后得知, 原来罗森教授与中国有缘, 他 1935 年出生在上海, 父亲曾在长沙工作过, 罗森教授的童年时代是在上海度过的。得知他的专著即将在中国翻译出版, 他非常高兴。此后, 我们建立了联系, 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我会不时通过邮件向他请教, 罗森教授不厌其烦, 每问必答。

我与罗森教授的进一步交往是在 2013 年的秋天。2013 年 10 月 25-27 日, “第三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任职的宁波大学举行, 罗森教授应邀出席会议并作大会主旨发言。作为会议承办方负责人和学会的副秘书长, 我与罗森教授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会前, 我邀请罗森教授在宁波大学讲学, 还组织了一个小论坛, 就 18 世纪英国文学与英语教育的关系与罗森教授进行了一场学术对话, 对罗森教授的研究领域有了更深入了解, 特别是他对斯威夫特的研究令我惊叹。老先生得知我对斯威夫特感兴趣, 特赠送我三本他亲笔签名的斯威夫特研究专著: 《上帝、格列佛与种族灭绝》(*God, Gulliver, and Genocide, 2002*)、《斯威夫特及其他》(*Swift and Others, 2015*)、《斯威夫特的愤怒》(*Swift's Anger, 2014*)。正是在翻译《上帝、格列佛与种族灭绝》和研读罗森教授有关斯威夫特的著作中, 我对文学作品中的野蛮书写及其文化隐喻有了更深的理解, 对罗森教授的治学之道有了深切的体悟。此后, 罗森教授当选为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会长, 我与他的联系更加密切。

2015 年, 我获得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访学一年。罗森教授知道后, 非常高兴, 并告诉我他的女儿就在爱丁堡大学工作, 若有困难可以联系她。老先生对晚辈学习和生活的关心令我十分感动。之后, 罗森教授从耶鲁大学荣休, 回到英国剑桥居住, 期间他不慎摔了一跤, 行动更加不便, 身体也大不如前。尽管如此, 身为会长的他一直关心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的工作, 每次年会都给大会发来开幕式致辞, 并由我代为翻译和宣读。罗森教授在每次致辞中都特别强调文学文本及其历史语境在文学阐释中的重要性, 他对文学批评理论界有人远离文学文本的“不读而论”现象表示担忧。2017 年 8 月, 受聂珍钊教授委托, 我作为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协调人联络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比较文学教授加林·提哈诺夫 (Galina Tihanov), 商议在伦敦举办“第七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具体事宜,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与跨学科研究”, 期间我与罗森教授保持密切联系, 协调安排他在大会开

幕式上致辞。会议开幕式当天早上，罗森教授由夫人琳达陪同驱车从剑桥的寓所来到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大会堂。由于行动不便，他坐在轮椅上出席会议，由夫人代为宣读大会致辞，他有关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演讲为大会奠定了基调。2024年，为致敬罗森教授对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做出的杰出贡献，学会决定筹备罗森教授九十岁生日纪念活动，聂珍钊教授再次委托我具体负责联络罗森教授，请他推荐有关学者撰写纪念文章，由《文学跨学科研究》推出纪念专刊。期间我与罗森教授的电子信件联系更加密切，他推荐的撰稿人都是18世纪研究领域的世界一流学者或出版人，拜读这些学者的文章令我眼界大开，这些文章充分表明罗森教授在18世纪文学研究领域的巨大学术影响力。

## 二、罗森的跨学科视域：以文学文本为中心

罗森教授的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视域，他对斯威夫特的研究往往见微知著，将文学中虚构的事件还原到相应的复杂的社会历史语境下来考察，融文学人类学、后殖民批评和历史文化批评于一炉，他的著作并不像有些文学批评著作那样晦涩难懂，而是由浅入深，语言朴实幽默，富有情趣，以扎实的文献材料和文本分析来呈现他的深邃思想和洞见。

《上帝、格列佛与种族灭绝》是一部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作，我和我的同事张陟和徐燕一起有幸翻译了这部著作。此书视野开阔，奇思迭出，观点新颖。乍看书名，似乎很难将书名的三个关键词“格列佛”“上帝”“种族灭绝”联系在一起。因为，根据普通读者对《格列佛游记》及18世纪欧洲文学的一般了解，种族灭绝与自命不凡的格列佛医生抑或是愤世嫉俗的斯威夫特应该关系不大，而仁慈的上帝与种族灭绝更不应该有任何瓜葛，且不说格列佛或斯威夫特与上帝之间在种族杀戮上存在什么内在的关联。然而，作者却巧妙地游走在虚构、历史与想象的边缘，依据细致的文本分析和大量的旅行及历史文献资料，从文学人类学和后殖民批评的角度切入，将格列佛、上帝与种族灭绝三个貌似毫不相干的概念置于“野蛮与欧洲想象”这一框架中，围绕斯威夫特和蒙田之间的互文关系、爱尔兰人与印第安人类似的悲惨命运、法西斯主义与二战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等问题展开了入木三分的分析。作者探幽入微，寻踪探秘，自1492年哥伦布的“发现”之旅一路追至1945年二战结束。通观全书，内容涵盖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政治学等方方面面的范畴，罗森教授渊博的跨学科知识和深邃的洞察力令人叹为观止。

但是，罗森教授的研究立足于精细的文学文本，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文献均服务于文本分析。尤为重要的是，他对所涉及的诸多学科有深入的研究，对其他学科文献资料的把握和理解令人叹服。罗森教授特别警惕的是，有些文学研究者为了追求跨学科研究而放弃了自己的文学文本分析优势，甚至本末倒置。此类做法在当今国内文学批评界也特别盛行，可谓“种了别人的地，荒

了自家的田”。2018年7月，“第八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九州大学举办，会议的主题依然是“文学跨学科研究”，罗森教授在给大会的开幕式致辞中这样告诫我们：

我很高兴地注意到大会的重点是跨学科性。这种跨学科性的前景是，在特定文本的研究中加入了其他学科的知识 and 视角，正如在比较文学中，对他国文学及其精确相关性的掌握能增强所研究文本或主题的实质及重点。但同时，在跨学科和比较文学研究中相应的危险是，其他学科或他国文学只是作为本学科或本国文学的附庸，前者在没有专业知识（包括第二语言知识）的情况下被引用，从而脱离了当前研究的主题，成为另一种抽象主义。我们都读过这类论文，例如，不熟悉经济学或经济史的学者写的关于“文学和资本主义”的论文。诸如此类不善于运用辅助学科却伪装成跨学科样貌的论文在文学研究中屡见不鲜。<sup>1</sup>

2019年11月，“第九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举行，盛况空前，罗森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再次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的过度跨界和抽象化现象以及文学缺场的现象提出批评，他说：

西方文学批评热衷于用理论话语取代文学文本而忽略对文本本身的研究，聂珍钊教授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对这一趋势的逆转。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理论至上的趋势已经导致西方大学养成习惯，一味采用各种理论和方法来进行文学研究——就是不去研读文学文本，不去发掘与文本相关的历史知识。自2004年以来，文学伦理批评试图通过恢复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来扭转这一趋势。这一批评有别于理论上的苦心孤诣，也不同于使人分心的旁门研究。理论研究即便殚精竭虑也总觉得似是而非，不得要领；旁门研究往往绕开文本，转向抽象的政治、经济、心理或其他学科，而文学研究者通常不太可能掌握与这些学科相关的专业知识。<sup>2</sup>

据我所知，罗森教授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对西方“理论”远离文学文本，漫无边界的跨越现象提出批评，对文学批评理论中大量抽象、晦涩、不堪卒读的术语堆砌深表担忧。他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在理论浪潮的冲击下，文学

1 参见 Claude Rawson, “Presidential Address for the 8<sup>th</sup>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IAILC,” July 2018, Fukuoka. 笔者译，Claude Rawson 致辞引文均系笔者翻译。

2 参见 Claude Rawson, “Presidential Address for the 9<sup>th</sup>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IAILC,” November 2019, Hangzhou.

研究的学科边界变得模糊，学科根基逐渐动摇。文化批评家、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赛义德在他逝世前终于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艰涩难懂的理论已经步入歧途，影响了人们对文学的热爱，他痛心疾首地感叹：“如今文学已经从（……）课程设置中消失”，取而代之的都是那些“残缺破碎、充满行话俚语的科目”（转引自盛宁 6），回到文学文本，回到叙事艺术，回到历史语境，才是“文学批评的正道”（王松林 11）。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也意识到过度追求抽象理论的危险，他说：“阅读福柯、德里达、拉康以及巴特勒的那些人很少有时间阅读阿什贝利和祖可夫斯基，更不要说狄更斯和萨克雷了”（4）。美国当代著名批评家玛乔瑞·帕洛夫在一次会议上也告诫同行，我们一些批评家可能是在没有适当资格证明的情况下从事文学研究的，而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地质学家、气候学家、医生、律师等必须掌握一套知识后才被认为有资格从事本行业的工作，我们文学研究者往往被默认为没有任何明确的专业知识。<sup>1</sup>这番话与罗森教授的担忧不谋而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 三、与罗森为伴：发掘野蛮书写背后的文化内涵

如果说学术阅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那么罗森教授便是读书这场旅行的绝佳向导和同伴。与罗森教授结伴而行，总能在文学之旅中有新的发现，罗森教授的智慧总能点亮文学批评的思想火花。他对斯威夫特作品中野蛮书写及其文化内涵鞭辟入里的分析指引读者穿过文本的表象，回到历史和文化的现场，拨开文学虚像的迷雾，洞察现实和人性的真相。

《上帝、格列佛与种族灭绝》是一部拨云见日的著作，一部从一句话出发演绎而成的煌煌巨著。这句话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通不过的、漫不经心的一句口头禅。当我们对某人怀恨在心或气愤之极时，免不了会狠狠地诅咒此人“应该枪毙”或者“从地面上消灭”，甚至说“活吃了他”。对于人们何以会在语言修辞层面上发出这番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咒语，我们少有人会去做严肃的追本溯源式的思考。大多数人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样的表述只不过是人们一气之下放出的狠话，并不意味着我们真要从肉体上消灭此人或是真正的吃人。但是，罗森教授却敏感地意识到了这句话背后蕴含的丰富文化隐喻。他以敏锐犀利的目光，追寻它的语文学和文化人类学渊源，对大量的文学文本和历史文献资料进行梳理，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挖掘出这一语言表述所遮蔽的实际暴行。罗森教授指出，自从上帝声称要用洪水把人类“从地面上消灭”起，种族灭绝意识便潜伏在人的邪恶的意识深处。在罗森教授看来，这句口头禅的内涵令人难于琢磨，但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可以是

<sup>1</sup> 参见 William M. Chace, “The Decline of English Department,” *The American Scholar*, 1 September 2009. Available at: <https://theamericanscholar.org/the-decline-of-the-english-department/>. Accessed 10 Sept. 2024

“说着当真”，也可以是“说说而已”，还可以是“不只是说说”（v）。全书围绕着这三个层面展开讨论，内容涵盖了从《圣经》创世纪到现今的欧洲文学和非虚构作品对“他者”的想象和书写，时间跨度穿越了从欧洲对美洲的征服一直到二战结束近600年的历史。罗森教授发现，在小说和“说说而已”之间、在语言和历史上的暴行之间有着诸多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他对斯威夫特、蒙田、萧伯纳、王尔德等作家笔下有关野蛮和杀戮的书写进行了精细的比较和分析，征引珀切斯、哈克鲁特、德勃莱、哥伦布、韦斯普奇、布干维尔、库克等诸多旅行作家和人种志史家的记述，透过浅层的言语修辞来窥视暴力行为的实施过程，试图撩开欧洲对野蛮“他者”的文化想象面纱。

罗森教授在《上帝、格列佛与种族灭绝》中花了大量的篇幅分析欧洲文学中“食人”这一最野蛮的暴行与语言修辞之间的关系。在对斯威夫特的《一个温和的建议》《格列佛游记》以及蒙田的《论马车》《论食人部落》《论节制》等作品做了细致入微的比较分析后，罗森教授指出蒙田和斯威夫特虽然反对殖民掠夺和杀戮行为，但是他们两人都曾认真地思考过大规模杀戮这一念头，他们那种乐意接受大屠杀并对之无动于衷的心态令人不安。罗森教授在序言中对于欧洲人之于“野蛮人”的态度有精彩的论述：

“野蛮人”令我们心神不宁。他们属于“非我”，他们不会说我们的语言或者“任何语言”，我们鄙视他们，惧怕他们，侵略他们并杀戮他们；我们又同情他们或羡慕他们并对他们抱有强烈的性趣；我们向往他们的天真和活力，他们对现代都市文明生活的行为和衣着产生了非凡的影响；我们称他们为野蛮人，但其实我们比他们更野蛮；他们相貌酷似我们，这令我们心神不宁，想入非非。（vi）

可以看出，罗森教授试图从个体文化差异中寻找出人类的共性。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现代“文明人”与所谓的“野蛮人”之间的差别并无二致。罗森教授对蒙田有独到的理解，指出蒙田是一个对“我们”与“野蛮人”之间的亲缘关系进行“痛苦探索”的思想家。这一“痛苦探索”的传统在欧洲文学中得以延续，也影响到了斯威夫特。书中单辟一章“杀掉穷人：一个盎格鲁-爱尔兰主题？”，讨论英国作家自斯宾塞到斯威夫特到卡莱尔到萧伯纳到乔伊斯的作品中有关爱尔兰这个“贫穷的王国”的吃人或种族灭绝的隐喻。譬如，斯宾塞（Edmund Spenser）就借用了爱尔兰人是吃人族的神话，在《爱尔兰现状考》中称灭绝爱尔兰人的迅速方法可以不必使用屠杀，而是“限制他们耕作，不许他们养牛，很快他们就会自己相互吃起来”（转引自罗森134）。这一主题在斯威夫特的《一个温和的建议》中以反讽的手法得以延续。罗森教授指出，“《一个温和的建议》更多指向的是爱尔兰的自我毁灭，而非

英国的剥削，尽管斯威夫特对英国总是抱着传统上外乡人对来自大都市的同胞的不信任的态度。（……）吃人话题被反转过来，不仅仅有富人与穷人，也有帝国权力与殖民主体”（140）。罗森教授有关英国文学作品中“吃人”的文化隐喻和历史事实的分析对重新阐释中外文学的“吃人”书写具有指导意义。

18世纪英国作家笛福（Daniel Defoe）的《鲁滨孙漂流记》（1719）中有详细的关于吃人生番的描写。一开始，鲁滨孙被眼前的吃人场面所震惊，惊恐万状，以致呕吐不已。但是，鲁滨孙很快镇定下来并开始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思考食人番的行为，他认为这些人可能并不知道吃人是犯罪行为，这一行为并不违反他们的良心。于是，鲁滨孙的内心世界展开了一场痛苦的斗争：

对这一问题略加思考，我就觉得自己不对了。我觉得这些人并不是我过去心目中所谴责的杀人犯。基督徒在战斗中常常把战俘处死，甚至在敌人已经丢下武器投降后，还把一队一队的敌人毫不手软地砍死。这样看来，那些土著人与战斗中残杀俘虏的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了这些考虑，我犹豫了，并几乎彻底停了下来。我开始逐渐放弃了这一计划，我断定，自己策划攻击那些野人的决定是错误的。（16）

在这里，笛福刻画了一个对基督教文化持反省态度的人物形象，鲁滨孙的这番内心独白并没有得到读者应有的重视。我们发现，鲁滨孙将基督教残杀俘虏的行为与吃人生番的吃人行为相提并论，这与蒙田将“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的亲缘关系进行的“痛苦探索”一脉相承。

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中也不乏“吃人”的记叙，这既是历史事实的写照，也是文学的隐喻或讽喻。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吃人行为原因复杂多样，或为饥馑所迫，或出于憎恨，或出于医疗，甚至出于忠孝的奉献。中国古代连绵不断的战争和饥馑导致的人相食的悲剧在史料上和文学作品中均有记载。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轻肥》一诗中记录了南方大旱引发的饥馑和食人行为，他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清代礼部尚书、文学家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中就记录了当时中国西北地区的饥馑和食人事件，人肉在西北（陕西）市场上公开出售并被政府默认为减缓食品短缺的交易。<sup>1</sup>战乱的古代，民不聊生，难以为计，人们只得将人烹而食之，当作食物被吃掉的人统称为“两脚羊”。这在南宋文学家、医者庄绰的《鸡肋编》卷有记载：“老瘦男子度词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不羨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sup>2</sup>现当代文学同样不乏“吃人”的描述和想象。鲁迅的《狂人日记》以隐喻和讽刺的手法讲述了

1 参见 郑麒来：《中国古代的食人：人吃人行为透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29-143页。

2 参见《汉典》“两脚羊”词条，<https://www.zdic.net/hans/> 两脚羊，2024-07-10。



一部中国文化“吃人”史，虽然小说中并没有发生任何真正的“吃人”事件，但是狂人眼中的一切似乎都要吃他：青面獠牙赵贵翁要“吃”他，赵家的狗要“吃”他，路上遇见的小孩子似乎也要“吃”他，甚至他疑心自己的大哥也要“吃”他。鲁迅笔下的“吃人”是对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吃人”本质的广泛而深刻的批判。比较而言，当代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莫言的《酒国》中的吃人记叙既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饥馑年代残酷现实的反映，也是对社会腐败和人性堕落的抨击。《白鹿原》中的一段传闻虽有夸张，但也并非空穴来风：

饿死人已不会引起惊慌诧异，先是老人后是孩子，老人和孩子似乎更经不住饥饿。饿死老人不仅不会悲哀倒会庆幸，可以节约一份吃食延续更有用的人的生命。只有莫名其妙的流言才会引起淡弱的兴趣，一个过门一年的媳妇饿得半夜醒来，再也无法入睡，摸摸身旁已不见丈夫的踪影，怀疑丈夫和阿公阿婆在背过她偷吃，就蹑手蹑足溜到阿婆的窗根下偷听墙根儿，听见阿公阿婆和丈夫正商量着要杀她煮食。阿公说：“你放心，度过年馐，爸再给你娶一房，要不咱爷儿们都得饿死，别说媳妇，连香火都断了！”新媳妇吓得软瘫，连夜逃回娘家告知父母。被母亲哄慰睡下，又从梦中惊醒，听见父亲和母亲正在说话：“与其让人家杀了，不胜利自家杀了吃！”这女人吓得从炕上跳下来就疯了。（261-262）

莫言的小说《酒国》虽然是一个虚构的国度，但里面的“吃人”描写极具象征意义。“酒国”的父母把孩子养成“肉孩”卖给“烹饪学院”的“特购部”烹制成“婴儿宴”。婴儿的烹制方法可以有“清蒸”“油炸”“白斩”“红烧”等，这一冷酷克制的叙事方法与斯威夫特的《一个温和的建议》产生强烈的互文。小说中酒国市委宣传副部长金刚钻不动声色地向前来调查的检察院侦察员丁钩儿介绍了“婴儿宴”：

金刚钻用筷子指点着讲解：“这是男孩的胳膊，是用月亮湖里的肥藕做原料，加上十六种佐料，用特殊工艺精制而成。这是男孩的腿，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火腿肠。男孩的身躯，是在一只烤乳猪的基础上特别加工而成。被你的子弹打掉的头颅，是一只银白瓜。他的头发是最常见的发菜。要我详细地、准确地把制作这道名菜的全部原料及其精细、复杂的工艺告诉你是不可能的，这是酒国市的专利，我也只了解个大概，否则我就改行当厨师了。但我可以负责地对您说：这道菜是合法的，是人道的，您应该用筷子对付他，而不是用子弹。”金刚钻说着，用筷子夹起男孩的一只手，大口大口地吃起来。（88）

莫言在小说的后记中说明了小说创作的宗旨：“原想远避政治，只写酒，写这奇妙的液体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写起来才知晓这是不可能的。当今社会，喝酒已变成斗争，酒场变成了交易场，许多事情决定于觥筹交错之时。由酒场深入进去，便可发现这社会的全部奥秘。于是《酒国》便有了讽刺政治的意味，批判的小小刺芒也露了出来”（365）。

美籍华裔学者郑麒来在《中国古代的食人：人吃人行为透视》一书中认为，“大体上，小说中的食人起因多是宗教迷信性和医疗性的，历史上的食人起因则多是普遍性和世俗性的。无论如何，在小说和历史之间至少有着某种相互联系，这不仅表现在食人行为的动机上，也表现在其他方面”（143）。这一观点尚可进一步补充，至少在罗森教授看来，文学中的吃人书写“不只是说说”——“吃人”既是文学的虚像也是历史的镜像，是语言、想象和现实的糅合。现在看来，当高唱“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时，人们并未意识到“生饮人血”，尤其是敌人的鲜血，在古代原本是一种符合伦理规范的复仇行为，是一种强身壮体、显示荣誉和权力的象征仪式。只不过，经过时间的推移和“文明”的进程，人们对此已经全然淡忘。

如前所述，文学作品中关于“食人”的记述实则是虚像与实像的糅合。必须指出，“吃人”不仅仅是一种存在于远古的、完全不开化、不文明世界里的恐怖的历史现象，“吃人”也远非像人们想当然的那样已然成为过去的野蛮行为。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历史也好文学也罢，既是实像也是虚像，我们在历史和文学中看见自己，构建自己，更须警醒自己。罗森教授在书中提醒我们要时刻意识到这一点：“吃人”的欲望一直以来就潜伏在人类的意识深处，所谓现代的“文明人”并不比其心目中的“野蛮人”高贵多少。

由上可知，罗森教授在研究中特别善于捕捉文本中微妙的、不易为人发现的道德情感和复杂的人性悖论，他严谨的批评话语后面蕴含了充满温情的伦理关切。2016年10月，在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举办的“第六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发来了一篇精彩的会长致辞，题为“Thoughts on Achilles' Heel: A Fable for Ethical Criticism”（“关于阿喀琉斯之踵的若干思考：伦理批评的一个寓言”）。那一年，他不幸扭伤了脚，所以拿“阿喀琉斯的脚跟”来自嘲，但是，紧接着他话锋一转，从希腊神话到荷马史诗、从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到莎士比亚到蒲伯和弥尔顿，从亚历山大大帝到路易十世和拿破仑，指出人们称赞不已的英雄史诗和宏大历史叙事中的伦理悖论：即一方面我们讴歌史诗中人物的勇敢和豪气，但另一方面又对其中的杀戮场面不寒而栗。罗森教授借用18世纪英国评论家约瑟夫·爱迪生（Joseph Addison）的一句话来评价阿喀琉斯这一人物形象的矛盾性：“道德上恶毒，唯有诗意上美好”（“Morally Vicious, and only Poetically Good”）。这句话充满悖论，从伦理和艺术层面对人性的复杂性进行了思考和追问：为什么我们在阅读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时，这种对立的情感能够共存？邪恶何以成为

一种诗意化的美？这些问题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罗森教授十分赞赏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伦理转向”中发挥的引领作用。在2019年“第九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致辞中，他提出“优秀的文学批评是伦理的”这一命题，并对“理论热”背景下文学文本缺场的现象给予了批评：

文本阅读本该是文学研究者擅长的领域，但最终学者们却舍本求末，绕开了文本。伦理批评不是一种简单的程式化的教条，它的精髓在于我们对文本整体的全面的感悟。优秀的文学批评是伦理的，它超越了解析性的伦理教条，甚至超越了那些可以依据作品来阐明的伦理教条，力图表现更大层面上的难于解析的人类整体价值。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代学术界有人宁愿什么都去做，就是不愿读文学文本的原因。<sup>1</sup>

罗森教授的这番话可能会冒犯一些理论家，但是，这就是他的批评立场，一个有学术智慧、创新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学者的立场。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英文系教授、18世纪文学研究专家约翰·雷切蒂（John Rhichetti）在《批评》杂志上撰文，盛赞罗森教授的研究风格和学术成就，他说：“他在史料问题上特别严谨，但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他善于发现文本的细微差别，但不是理论家或解构主义者；于我而言，罗森教授在很多方面都堪称楷模，他的著作可读性强、信息量大、审慎而富有人情味（……）他的杰出之处[在于]，他不仅是一位学术专家，而且是一位最好的老师。”<sup>2</sup>确实如此，罗森教授不仅是一位杰出的18世纪文学研究专家，更重要是，他是一位“最好的老师”。拜罗森教授为师，与罗森教授为伴，重读中外文学中的野蛮书写，在文本和历史的交汇和对话中，隐藏在语言深处的历史文化景观便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

## Works Cited

Chace, William M. "The Decline of English Department." *The American Scholar*, 1 September 2009.

Available at: <https://theamericanscholar.org/the-decline-of-the-english-department/>. Accessed 10 September 2024

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

[Chen Zhongshi. *White Deer Plain*. Beijing: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12.]

1 参见 Claude Rawson, "Presidential Address for the 9<sup>th</sup>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IAILC," 9 November 2019, Hangzhou.

2 参见 Claude Rawson, *God, Gulliver, and Genocide: Barbarism and the European Imagination, 1492-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封底。

乔纳森·卡勒：《理论中的文学》，徐亮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Culler, Jonathan. *The Literary in Theory*, translated by Xu Liang et al.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P, 2019.]

Defoe, Daniel. *Robinson Crusoe*.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1.

Eagleton, Terry. "A Spot of Firm Government."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3 August 2001. Available at: <https://pugpig.lrb.co.uk/the-paper/v23/n16/terry-eagleton/a-spot-of-firm-government>. Accessed 10 September 2024.

莫言：《酒国》。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

[Mo Yan. *The Republic of Wine*. Hangzhou: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9.]

Rawson, Claude. *God, Gulliver, and Genocide: Barbarism and the European Imagination, 1492-1945*. Oxford: Oxford UP, 2001.

克劳德·罗森：《上帝、格列佛与种族灭绝：野蛮与欧洲想象：1492-1945》，王松林等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

[Rawson, Claude. *God, Gulliver, and Genocide: Barbarism and the European Imagination, 1492-1945*, translated by Wang Songlin,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3.]

盛宁：“对‘理论热’消退后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文艺研究》6（2002）：6-15。

[Sheng Ning.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after the Recession of Theoretical Upsurge."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6 (2002): 6-15.]

王松林：《寻找被放逐的文学——西方文学散论：细读、比较与判断》。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

[Wang Songlin. *In Search of Literature Exiled—Essays on Western Literature: Close Reading, Comparison and Judgment*.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6.]

郑麒来：《中国古代的食人：人吃人行为透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Zheng Qilai. *Cannibalism in Ancient China: A Perspective on Man-Eating Behavior*.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1994.]